

界我正一边望着窗外景物一边往摊在台子上的小本本写着什么的时候，突然被人从后面拦腰一抱。本子登时给夺去，我被看管了。这时同行的施兄也吓傻了。火车开到河口，我立即被押到边界哨站去。幸而施兄也跟了来，经过反复盘询和检查，又摇了一通电话，才弄清我的良民身份。

然后到了老街——法殖民者的天下。海关检查员像刚喝了一肚子烈性酒：脾气暴戾，把箱子里的东西翻腾得乱七八糟。幸而老友周承刚巧在那里的交通银行支行工作，承他照拂，总算平安抵达海防。

接着还有三天海路！

一走进皇后大道中的报馆编辑部，就又看到老同事了，真是恍如隔世啊。

走在香港马路上，感觉也十分异样。一年前，我同“小树叶”路过香港时，境遇和心情有点像丧家之犬。如今，有了职业，就恢复了自信，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马路上遇到熟人，又可以报一下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了。失业者与有职业的，在自尊上悬殊多大啊。更重要的是：尽管我没去敌后或延安，毕竟又站到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岗位上了。我决心把《大公报·文艺》办好，让它依旧在文化阵线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干的还是老行当：编《文艺》并负责一个娱乐性副刊，如有余力，就往内地跑跑。

到香港后，稿源很充足。娱乐性的刊物虽归我负

抱起的小湖，有绿草地长长地伸入湖中，形成天然的码头，是最动人的景色了。难怪那法国领事捺不住泛舟的想头。但这温柔而比重太轻的水，终于把他揽在怀中了，成为他的葬身地。途中所过车站的名字都古古怪怪，什么羊街子、狗街子、拉黑黑，总之，使你觉得确已走到最辽远荒凉的地方了。在两旁，还时常出现猓猓人，扶了篱笆门，用迟钝的眼睛对你瞭望。到阿迷洲这段，是如爬山的初步，为了路的崎岖，风景的离奇，旅人有的只是叹惜。

车由阿迷洲开出，到老街这段，简直如做了场噩梦。什么都变了样子。一望无际的芭蕉园，开的尽是巨大鲜红的花，古怪怕人的蝉(?)鸣，由羊齿植物的丛莽中发出。瀑布如天河般由山腰倒挂下来，倾泻着万斛银珠。出现在你左边，右边，全是死命嚼着槟榔的安南人，用麻雀吵架的声调攀谈着。然而你一定没有心情听。天哪，一天要钻一百多个山洞！有的由山左侧钻进，在洞里转了方向，却在另一方向钻出，有时还由一座山的悬崖钻入另一座。洞里阴森滴水倒不可怕，骇人的是那些有名堂的桥，丝带桥，人字桥，只适于想象的奇迹；（然而被一个法国女人完成了。）这一天，车如天马般在滇南的山顶上奔腾。不容你叹惜了，它令一个胆小的掩起眼睛，胆大的起了疑惑：人怎么这样有本事，把山拆成这个样子！

这真是一绝妙安排。阿迷洲到老街，一天盘桓在云雾里钻出钻入百多山洞，简直看不到一片平原。但

文字的成功。安南本来使用的是汉文。自从为法人抢去后，一个法国教士就在这上面用了功夫。今日的“安南文”只有声音而已，文字已全拼成字母了。我看到洋车夫也能拿一本小书消遣。安南几种“月刊”“半月刊”在小贩走卒手里也可找得到。我曾向一个年轻木匠手里借看过一本，里面还有两篇由汉文翻成的，都是《江湖奇侠传》一类与现实无关的东西。拉丁字本身之较方块字容易推行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技术，学习心理的事实。它可以灭绝一国的文化，也可以推展一国的文化。可以麻醉，也可以警醒。这便轮到使用的问题了。

使我更惊讶的，是在唐人街上一家小书店中，我看到法文和安南文的《第一届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经过》以至节译的《资本论》。法国统治者的宽容究竟能放到那样远么，笔者可不敢论断了。

总之，沿途我没看到预期的鞭打，虐待。我绝对不要颂扬统治者，我只在想我一个安南朋友的话。他说：自从中日战起，法国因需要安南土人在国防上合作，更怕他们受野心的日人利诱，在待遇上已在改善了。

可是，亡国之恨依然很明显地呈现着。

只缺乏一样

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美丽

在那个阶段，理发也仍然得到经常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叩了叩门。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当又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发表过我对这件事的一封抗议信。

最不愉快是当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那阵子。由于我应援华会的邀请，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又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珍珠港事变后，一夜之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如气球般地腾高起来，成为“伟大盟邦”了。然而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尴尬局面：有时被误认作是日本人。

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里，后排突然有个喝得半醉的乘客用赛马场上的行话连声嚷着：“嗨，你押错了马！”他越嚷越激动，后来索性把头探到我脖颈后了，酒气喷得我难以忍受。这时我才察觉他是在朝我嚷，

的性格。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越研究越感到这一派的写法在艺术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我已经几次在同导师的讨论中讲出这个看法，那也正是我计划在论文的结构中所要表达的观点^①，说不定由于这种观点我就可能过不了关。另一方面，没能在本国的战场上跑跑一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一大憾事，在西欧当个战地记者也未尝不是一种弥补。

于是，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就告别了那座恬静的中古学院，告别了我书室对面那座峻宇雕墙的教堂——它那深沉悠扬的风琴朝夕演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名曲；告别了碧水萦回的剑河和拜伦塘；告别了我时常去凭吊的古罗马城堡遗址，投身到风驰雨集的报业中心舰队街了。

我同纳粹的炸弹似乎颇有缘分。一九三九年冬天，他们没派一架轰炸机光顾伦敦，东方学院却疏散到剑桥。转年迁回伦敦，恰好赶上了有名的“不列颠之战”。一九四四年夏天回到伦敦，正碰上希特勒祭起他那两宗法宝——飞弹（V1）和火箭（V2）。所谓“无人驾驶飞机”成百上千乌鸦般地满天飞，日夜在头上盘旋着，随时俯冲而下。一九四〇年纳粹德国没炸断过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回炸断了。我的住

^①在《珍珠米·詹姆士四杰作》中，我曾带上一笔，见（原书）第100~102页。

她的狼狗，那动物跳上跳下，影子投在码头上宛如滦州戏。饭厅门口却凑了一堆愁苦的脸，那是中国籍的茶房。一个头目说在这公司已经混了十四年。然而那没关系，明早九点前，他们也得走了。那是说，就得开始落魄了。

在静止的船上睡了一夜，一睁眼，早饭的铃又摇了。

呵，这真是世界上最诡秘的戏弄！一个犯人如果吃到最后一餐，他还知道躺在他眼前的厄运呀，然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悠闲地吃了早餐。只是在出饭厅时，那个还巴望小费的茶房才说：“快呀，快去头等吸烟室！”

——大约是登记人名，分配旅馆吧？我们想。

吸烟室里这时叉腰站着几个便装的彪形大汉，穿制服的是安南人，都是陌生的面孔。把门那个人，见到中国客人进来，便粗鲁地抓住了肩头，给排在行列里。人还没到齐，一个身量矮小，灰头发的白种人由口袋里扯出一叠纸来。登时，长条的脸上那对暴戾的眼睛向我们扫了一遍，便用谁也听不懂的口音点起名来。这难怪他，一般客人的姓名是照英文拼的；然而他是法国人。这原是两不怪的，但他每点一个名，如不立时有人答应，他的眼里就冒起火来。我们很奇怪的是三等原也有两个日本人，二等有五个印度人，另外挪威、瑞士、波兰、荷兰、美国人自也有，但是这行列里排着的却没有他们。

一个法国神父要我猜他的年纪，我真猜不出：一张稚气的脸，玉蜀黍样的长须，茂盛地由他颊部蓬起，直垂到胸脯。白色的道袍，黑腰带上佩着庄严的十字架。这年纪才二十八岁的神父，非常珍爱他这一副胡子，让红海的风吹它，让地中海的太阳晒它。到夜晚，他述说种种奇迹，劝我皈依天主。快到马赛时，要我替他这胡子照张相，为什么呢？一上岸，这副自幼留的、精心修剪的胡子，便将与他永别了。他是个一九三七级的骑兵上士呢！剃掉它，马上便拿起枪杆来了。

“这不和你的信仰冲突吗？至少它犯了十戒之一。”

他奇怪我的质问。上帝是嫉恶如仇的，他说。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应该比一个普通兵士更勇敢向前，上帝并没有要他屈服在恶霸的淫威之下，“有法兰西，方有世界。”

说着，他可又带着依恋之情捋起那副胡子了。然而对于杀敌，他是那么迫不及待。

我总在怀疑，宗教，传给东方的和他们自己信的，是两码事。到了民族存亡时刻，神父也还是脱下道袍，剪掉胡子，奔赴战场的。制服希特勒靠神力是不中用的，还得靠人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剑桥

原载 193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香港《大公报》。

我准时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进了战前专开往法国的第十四站台。在辅仁（1930—1932）和燕京（1933—1935）一直与我同窗的老友陈纭早已等在那里了。看到我那身军官装束，土绿色呢大氅和哗叽制服，以及脚上的高筒靴子，他就拍拍我的肩膀，笑说：“这回你可当上官儿啦。”

这是一列军用专车。校级乘头等，车厢里宽松得很。整八点，拉了汽笛，列车移动了。我就算是踏上了征途。我平生没从过军，更没上过前线，心里自是感到激动。车窗外的景物都十分可人。顶使我兴奋的，还是那不可知的未来。当晚睡在哪儿，三天后又将奔驰在哪儿。我脑子里浮现种种图影：忽而翱翔在柏林上空，忽而又在战壕里钻来钻去，像是在同敌人玩着捉迷藏。

十一点，火车到达纽黑文港。这是同法国迪埃普遥遥相对的英国港口。从车站可以望到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可是一位大嗓门的高个儿中尉在站台上嚷着：“海峡里纳粹潜艇特别活跃。今天不能渡海，什么时候能过去，等通知。现在先军官靠左，士兵靠右，到候车室集中。行李有人照料。”

这可有点丧气。只好跟同行的军官搭大轿车到附近营盘去度夜，一呆就是五天。这期间，海峡正进行着一场战斗：英国内海舰队在包围几艘德国潜水艇。

五天来，我就同十几名军官厮混。那一带是英国有名的消暑胜地。这时，由于战争，旅馆大门上了锁，

在钢琴凳上就弹起小调来。我们一边喝，一边唱。午夜醒来才听到隆隆炮声。纳粹在莱茵河作最后的挣扎了。

同来的多是英、美及瑞士的大通讯社记者。我在考虑自己这个孤家寡人的采访计划。去抢战局的热门新闻我肯定抢不过他们。一个电传，他们的消息就能直接拍回总部，然后就传布到全世界了。我则只能先拍给伦敦，再由高尔太太转发到重庆。时间上我也处于绝对劣势。我决定不去傻拼。

当时，我设想远东大反攻时，中国军队可能也在日本本土登陆——当时，自然没料到美国会拿出原子弹，更没想到日本将由美军独家占领，中国只能坐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摆摆样子。我计划采访一下美军临时组成的军政府，就向联络官要了一辆吉普，他还派了一名上尉做向导。

我们在莱茵河畔四下驰骋，踏访了两座村镇：葡萄园荒芜了，被炸毁的坦克如硬壳虫般地在田地上东倒西歪，旁边躺着戴钢盔的尸骸。饥饿的军马和饥饿的人在山坡上徘徊。各村镇的党部是军政府搜索的第一个目标。有的头目逃走时，慌张得连假牙都没顾得上戴，还撂在抽屉里。

从这里往伦敦办事处发了几封关于军政府的电报。不知是高尔太太还是伦敦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由于是来自前线的，重庆还是照登了，回伦敦后一看报，真令我啼笑皆非。

审了将近一个小时，始终也没抓到一个可拍的“凶相”镜头。后来，索性问他：“纳粹见了纳粹，怎么敬礼法儿？”其实，他只消伸伸右臂，就可以勉强交卷。可那家伙不晓得这意图，只一个劲儿低头哈腰说：“当时整个德国，人人都那么敬礼呀！我咒诅希特勒，誓死再也不行那样的敬礼了，再也不敢啦。”

我们要他扮演的是个纳粹死硬分子，可他只肯扮演一个彻底悔过者。这么阴错阳差，这张新闻照片终于还是落了空。摄影记者一边收拾他那些照相器械，一边咒骂着：“真没骨头，希特勒白栽培他了。连敬个礼也不肯，他妈的！”

我们这一伙正要动身，跨过莱茵河去东岸采访时，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封电报，要我火速赶回伦敦。

回伦敦之后，才知道旧金山将要开个联合国大会。重庆报馆决定把我从莱茵前线抽回，要我马上赶到美国。电报里还说，老板胡霖也将以中国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前往。

第一件事是赶办护照。一九三九年从香港来伦敦时，护照是由报馆给办的。去美国可费事多了。不但得亲自去办手续，而且还要填一大张表格，上面问的真是五花八门，不但问了“你是否无神论者？”还问“你是否有意颠覆美国政府？”“你是否存心破坏美国治安？”只要在那一连串侮辱性的问题后边粗心地写上个“是”字，就非但去不成美国，就连在英国我也

台后探头探脑，否则会感到幻灭。及至参观影棚里的设施道具，看到惊涛骇浪的海景原来是在大水池子里拍的，我便担心今后好莱坞惊险片再也不能使我提心吊胆了。

那天的午饭是在影城的快餐厅吃的。我翘首望着走进来的一个个明星，而坐在我邻桌的恰好是我十分崇拜的贝蒂·戴维丝。她边吃边同一位像是导演的男人在争辩什么。我很想跟她握握手，但看到他们谈得那么激动，不便去打扰。

当晚我是在影城一位叫路易斯的导演家里度过的。他请了女明星琼恩·费沃尔作陪。他们问了我些中国电影界的问题，我大部分都只能支支吾吾，甚至干脆答不上。路易斯先生则由戏剧的节奏谈到国际政治，说双方越是拍桌大吵，越不必担心。戏剧的紧张场面向来有起有伏。当高潮真正到来时，倒往往来得十分沉寂。什么时候消停下来了，武戏也许就快开演了。

由洛杉矶南行，经过辽阔多山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以戴宽沿帽的牛仔闻名于世的得克萨斯州，遂来到把着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这是一座富于十八世纪法国色彩的古城，悠闲潇洒，像是摒弃机械文明的世外桃源。我走访了当年拍卖黑奴的场所，还去了一家酒馆，据说那是个醉鬼不断出没之地，时常酒后出人命案子。方场周围是林立的棕榈，树荫下徜徉着歇凉者，沿着墨西哥湖边，戴巴拿马帽的人们在钓鱼。晚饭是在一家螃蟹馆吃的。上过甜菜后，电灯突

者，守在欧洲战场这个岗哨上，我总不能佯作没这件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而言，这还是件意义重大的壮举：不是把歹徒不声不响地枪毙掉，而是让他们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且准许有辩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受审，然后根据最后判决来处理。这本身就表现了民主国家与纳粹罪恶集团作法的截然不同。而且审判过程也就是揭露他们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深刻的教育效果。

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我由伦敦乘飞机先赴法兰克福。今番是和平时期的旅行了，坐的不再是硬邦邦的运输机，而是架绿色的德寇塔客机。座位上还事先放好一匣冷餐：三明治、甜点心、四块糖果和一个西红柿。纸匣上有趣地印着一幅从古籍上影印的图案，下书“十七世纪的飞行观念”。画的是一具大木架，上系十四只巨鸟。架子下方坐着驾驶员，手挥布帆，以左右方向。同机的多是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也有几名军人。我是惟一的战地记者。

机翼下的英吉利海峡，法国的农村以至莱茵林的树林，都是我曾跑过的地方。这次又从空中俯瞰一下，深切体会到和平时期的美好。可不知人们要多少时候才能把下面的废墟再变成田园。

下了飞机，瞥见机场上正停放着一架巨型客机。通身以红蓝二色画着作为美国国徽的巨鹰，这庞大银物身上还用英俄文标着“美利坚”字样。使人感到战后世界的现实：以权力威慑权力。

掉过头来问我：‘你想去看看吗？’我听了，半信半疑。

“有一天，他在我床底下捡到一颗军装纽扣儿，就气冲冲地逼问我：‘什么混账军官到这儿来过？’我说六年来，除了他以外，从来没有男人进过我的卧房。但是他不相信，咒骂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一半为了安慰他，就扯了扯他的领子，忽然发现缺了一颗纽扣。我指给他看，他服了。他像小孩子似地跳跳蹦蹦地说：‘我的天使，我的心肝儿！这浑蛋仗已经打完了，咱们到俄克拉荷马州开铺子去。’我说：‘我愿意给你生一个模样儿像你的娃娃。’他知道我已经三十六岁，足足比他大十岁，说：‘在你这个年龄生头胎，太危险啦。’

“他为什么偏爱我，我可不明白。他说，在我以前，他有过一个十九岁的波兰姑娘，天天缠着他买这买那。自从有了我，谁也不要了。

“于是，我们相互坦白起来。我告诉他：‘一九三九年我交过一个男朋友。一天晚上，他送我回家。我刚下车，一个黑影儿就钻进了他的汽车。原来他同时和三个女人相好。我们就这样吹了。’撒姆少校也说：‘我有过一个女朋友，有一回她向我借汽车用。回来后，我发现了男人在车里呆过的痕迹。我问那女朋友：‘你跟一个男人到得克萨斯州去了吧？’她不承认，我就把证据摆出来，我们就吹了。咱们俩都上过别人的当，可不要彼此给当上了。’

门前悬着法苏美英旗帜。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一位手指颤抖的老妪在摆摊，兜售黑麸面包。

吉普开上阿尔卑斯公路，两旁白杨的梢头直插蓝天。山脚下是多瑙河的支流，倒映着雪峰坡上的红叶。公路同因斯布鲁克河始终并行着。有时河身因山势阻挠，打个弯子，像捉迷藏似的不见了。转过山脚，它又闪亮在眼前了。山坡上密密麻麻长着玉米，一座蒜头形的拱顶教堂俯瞰着山谷里的和平村落。

走过一道漆成三色的关卡，法国哨兵粗暴地嚷：“拿出你们的通行证来！”同伴用更粗暴的声音回答说：“美利坚！”我听了，正自感到不舒服，那哨兵却不再索看证件，就向我们敬了个礼，放行了。在法占领区，偶尔还看到一些来自北非殖民地的摩尔人，头缠白布，腰系红带。看守意大利战俘营的，是来自亚洲的安南兵。战后的法兰西不但物资缺乏，人力必然也感到不足。

一阵军号声，我们的吉普又被警察拦住了去路。暮色苍茫中，只见街心圆场上，笔直地站着一簇当地的男女老少，无精打采地望着圆场中央。旗杆顶上的三色旗这时正迎风徐缓地沿着旗杆降落下来。也不知法国占领当局的这种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措施，在新一代德国人心中引起的是屈辱感，还是刺激着报复心。

我们下榻的旅馆老板原是在柏林开电车的。问起法占领军的政绩，他耸了耸肩说：“打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在这当儿，几个法国人进来了。他赶

滇缅路开放之前

四月里，记者在剑桥听完那场《英国应否援助中国抗日》的辩论后，归途，一边在灯火管制下这座大学城的中古小巷兀自走着，一边叹息着：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好朋友，惟独国家的好朋友只有自己！七月中旬在威尔士西岸游历时，读到了痛心的消息：千万人的血汗筑成的滇缅路，仅仅为了“减少帝国局势之紧张”，就被封闭了。当时英国舆论界的确哗然。但舆论终归只是叫嚷而已。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议会何尝不曾热烈地辩论过？丘吉尔在下院还堂哉皇哉地说：“如果吾人同意永久封闭该路，则无异失信于一中立友邦。”《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说：“吾人封闭该路三个月，亦即失信三月之久。”七八两月全英商人如何反对暂时不去提它，国人所关心的，第一是这个月中，该路究竟封闭到什么程度。第二，是三个月后还有重开的希望否。这也正是记者赶回伦敦后，探访的目标。

救护队汽油

虽然此间援华会严词要求“立即无条件开放滇缅

言三个月后即可恢复原状，但深信滇缅路绝无永远封闭之理。甚至滇缅铁路之修筑，亦无绝望之理。（四）经此教训，大使愿国人益知惟自力更生，抗战前途方有把握。外力可利用而不可倚靠。

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于伦敦

（原载 1940 年 10 月 17 日香港《大公报》）

〔作者按〕

一九四〇年，当东南沿海各省相继陷落后，滇缅公路成为我国与外界惟一的通道。是年七月十八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保全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悍然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对我抗战极为不利。但是英国这一不义之举并没能改变其帝国在远东的命运。香港沦陷后，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了。此文描述滇缅公路封锁期间，英国朝野的一些动态，从而可以看到所谓信义只是民间的事，政府在关键时刻，讲的只是利害而且往往只是眼前的利害。从此文还可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国人民的命运，是如何操纵在强国手里的。

选自《萧乾全集·特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版。

纽伦堡访狱

十月九日 离开威城

由威斯巴顿（美占领区的西界）到东南德的纽伦堡，共约三百公里。晨九时送我东行的吉普车便到了旅馆门口。开车的下士紧紧催着我走，说他今天还得赶叫来，晚上七点在邮政总局台阶上和一位金发女郎有约会。原想在威城里绕一下，向青田朋友道个别，并南折看看新开张的海德堡大学，但经他一央求，只好登车直驱纽城。

吉普一路平均每小时五六十里飞驰着，滑过金黄的南德农田，穿过无数阴飒飒的森林。山影斜印在麦浪上，抖擞着，牛羊徘徊在于草堆丛中。田里偶尔有新释放的德俘虏，行囊背在绿色的陆军制服上，无目的地向四下张望着。山头时有倾圮的古堡，记载着封建时代欧洲的战史。最动人的莫如沃兹堡城的古堡：崖下是蓝蓝的梅因河，背后是层层远山屏围着。褐灰色的古堡坚实的盘踞在崖壁半腰，堡身遍是孔痕，述说着它的战绩。河上的石桥，正是乌兹堡的通衢，簇拥着车马行人。